

蔣復璁著

珍希齋文集

卷三

(383)

李靜農署



蔣復璁著

珍帚齋文集卷三

宋史新探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珍希齋文集 卷三 宋史新探

目 錄

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	一
宋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考	四三
宋太祖實錄纂修考	五〇
宋太宗晉邸幕府考	六〇
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	八二
王安石評傳	一二四
「宋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編纂計畫	一五〇
浙江對國史的貢獻	一五三
重印歷代名臣奏議序	一五八
岳飛傳記	一六〇
宋太宗失德三事考	一二五

舊滿洲檔序	一一七
故宮文獻發刊詞	一一九
年羹堯奏摺專輯序	一一一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序	一一二
中國歷史精神	一三四
宋太祖時太宗與趙普的政爭	一四二
景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	一六七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序	一六九
宋太祖孝章宋皇后崩不成喪考	一七一
景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序	一九八
舊滿洲檔譯註序	三〇〇
松禪老人墨蹟尺牘序	三〇一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序	三〇四
郭嵩焘書札跋	三〇六
景印商務官報序	三〇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序	三一〇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序

湘鄉曾氏文獻目錄序

三一四
三一二

目
錄

三

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

一、引　　言

什麼叫做國策？先叔百里先生在軍事常識裏說：

國於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國本。國本者根據民族歷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國本，而應之於內外周圍之形勢，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國是。國是者，政略之所從出也。

國是就是國策，這是一個民族根據了她的歷史與地理的特性來應付她的內外周圍形勢而決定的一個策略。世界各國多各有其國策，吾國列朝也各有其國策。宋代的國策是強本弱末，也有稱爲強幹弱枝，這是漢唐相傳的傳統國策，而宋代特別注重，對於宋代的興亡有莫大的關係。發明這個國策的是漢代婁敬，漢書婁敬傳說：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旦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

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這個國策的起源，還是因為都於關中的緣故，漢高祖本來想建都洛陽，因為這些功臣都來自江淮山東，所以如此主張。婁敬認爲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守住關中，則「掩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均見漢書婁敬傳）這也根據於秦始皇移東方豪家十二萬戶於咸陽，建設首都；一面集中豪家，使不爲亂；一面充實關中，可以應中原之變亂及防備胡寇之內侵。以後漢文帝聽鼂錯之謀移民實邊，武帝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上郡，會稽一次凡七十餘萬。還有陵寢徙民的制度，淵源於秦，而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多徙富民及郡國豪傑，內實京師，外消姦猾，這就是強關中的根本，削弱郡國的末枝，所以稱爲強本弱末。此一策略，創始於西漢，下迄隋唐，尚有陳寅恪先生所謂鮮卑的八柱國關中政策。宋承五代，建都大梁，本不是我國統一朝代的國都，所以宋太祖於平江南之後，即想遷都洛陽，逐漸遷至長安，復周漢之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開寶九年二月條說：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上不從，旣畢祀事，尙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曰：「遷都未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勢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

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李焘注說：「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現見邵氏聞見錄所引，內容相同。宋太祖想建永久的首都於長安，仍是強本的關中政策。但是李懷忠以為「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則其時晉王（即宋太宗）及李懷忠等認為本是東京。宋太宗、李符及李懷忠為什麼反對遷洛，吾另有所考。總之自此之後，所謂強本就強其政府所在地的東京（開封）。

宋楊仲良編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六，熙寧二年閏六月丁亥條說：

上問：「唐都關中，府兵都在關中，則爲彊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更不足待外方。」

安石曰：「府兵處處可爲，又可令入衛。」

宋神宗想效法唐代立府兵制，如府兵多在關中，則其時首都之東京實無足恃，並非彊本了。王安石以為府兵處處可爲，也可如唐之上番入衛，以東京爲本，這就是荆公立保甲的原意。除此之外，宋代言強本弱末者甚多，例如：

(1) 續編資治通鑑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條說：

戶部副使包拯言……臣聞京師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聚，此彊本之兵也。……彊本者，畿兵爾。本固自彊。……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墮祖宗之制，獨不忘唐王室建中之事乎？

(2) 同書卷一五六，熙寧七年九月庚子條說：

……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遷戍裁足守備而已。四方有警，則

兵從之出，故邊無橫費，而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以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悉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上曰：「邊有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裝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

(3)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紹興元年七月條說：

是月吏部員外郎廖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五衛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

從這三個例證裏，知道宋代自開國到南宋都講強本弱枝之道，而強本則強京師帝室親將之畿兵，就是禁軍，如邊兵強於禁軍，即成宋神宗所謂倒裝浮圖了。雖神宗亦說：「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制諸道而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見楊仲良編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六）然京師究重於諸道，禁軍不能不強，故范仲淹上十事，他在第七事修武備中說：

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常須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以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二，慶曆三年七月丁未條。）

熙寧二年主張退兵，損禁軍月廩，使就食江淮，龍圖閣直學士陳薦上疏說：「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可知宋代禁軍對國家雖「困生靈，虛府庫」，但祖宗定制是「重內輕外」，換言

之，就是「強本弱末」，所以不能改作。北宋貧弱之因，即種於此。而弱末原以強本，本腐自弱，於是與末俱亡。金人靖康所以得逞，即此之故。南宋重蹈覆轍，自壞長城，卒以衰弱以亡，則兩宋因何而堅守這個國策，其利弊所在，影響所及，皆有檢討的必要了。

二、「強本弱末」的背景

為什麼宋代對於「強本弱末」這個國策如此注重呢？這是有他的特別背景的，我們知道五代更迭是唐代藩鎮跋扈變亂的延續，擴大而為朝代的改換，軍士擁立皇帝與擁立節度使無異，如此擁立皇帝，宋太祖前，已經有過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瀋王從珂，周太祖郭威三次，所以陳橋兵變是第四次的擁立，在性質上與過去並無不同，不過安排得更妥貼，而預謀的痕跡更是顯然而已。所謂預謀的痕跡，最明顯的即陳橋兵變完襲自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變，我將兩次相同的事實做一對照如下：

澶州兵變。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本紀說：

「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

「諸軍將士大謀趨驛，如牆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陸，扶掖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沮喪，悶絕

數四。」

陳橋兵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說：

「鎮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恭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

「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光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廳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

從上面三事的比較，知其相類，陳橋兵變完全模仿澶州兵變，而布置周密，則後勝於前。如：

(一) 契丹入寇，在周則並無下文，在宋則宋史太祖本紀說：「己巳，……鎮州郭崇報：『契丹與北海遁。』」前後脈絡井然，毫無破綻。但是兵未戰而退，已屬可怪，並且周正內部有事，反而退兵，更是可怪。續資治通鑑考異說：

據遼史穆宗紀，應歷十年正月無用兵事。又遼史蕭思溫傳云：「周師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以事勢度之，顯德六年周師取三關，遼人敗衄之餘，羣情震恐，斷不能甫逾月即舉兵南下也。遼史不載此事，得其實矣。

這是很明顯的乃子虛烏有之事，僞造入寇，以便取得軍權，所以范質執王溥手說：「倉卒遣將，吾

輩之罪也。」（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足見他的後悔。

(二) 兵變這一幕的楔子是先由知星象的軍校苗訓及門吏楚昭輔看「日下復有一日」，設如天上的太陽真有這種現象，爲何見者僅有知星者苗訓及親吏楚昭輔兩人？據宋史本傳苗訓後擢爲翰林，於天文星象不聞有其他表現。楚昭輔是太祖的親吏，陳橋兵變，先遣進城，問候太后起居的。而宋史天文志說：「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楚昭輔也竟變成當時的天文家，可知他們的天文均爲此一幕用的，故在軍校而知星者苗訓之外，又用一親信來同看「此天命也」的「日下復有一日」，即可明白了。

(三) 潼州兵變是「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陳橋兵變則「以黃袍加太祖身。」黃袍從何而來，非先有準備不可。且「羅拜庭下稱萬歲」與「登牆越屋，……扶掖擁抱……帝在萬衆之中，聲沮喪，悶絕數四。」亦完全不同，非事先有備，不能秩序井然，而後勝於前的。

就此三事可證模仿之說，如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所論斷。陳橋兵變既是宋太祖的模演，則非其絕對掌握此軍隊，不能操縱。他掌握的這支軍隊就是禁軍，這支禁軍本是梁太祖朱全忠的宣武鎮軍，經歷梁唐晉漢周數朝而來的。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康義誠傳後說：

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唐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石林燕語卷六說：

都指揮使本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本紀說：

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累朝以來，老少相半，強懦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三，熙寧五年五月庚寅條說：

因論及宿衛盡是四方亡命姦猾，非宗社長計。上曰：祖宗厚以財帛官職撫此輩，固爲此。安石言：五代之變皆緣此輩。

五代禁軍既淵源於梁之宣武軍，素質本不甚好，且經歷五代，每次更革，多以犒軍及奪市爲酬庸之具，於是五代變亂，均由此中發生，誠如宋神宗所說。梁均王朱友貞之討郢王友珪，唐明宗李嗣源之叛莊宗，潞王被圍，能轉禍爲福及入京師，劉知遠之即位，郭威之入京，那一次不用這支禁軍，那一次不是犒賞就是大掠。宋太祖伐周，當然要借用這支禁軍。其能操縱這支軍隊的原因，大約有兩種關係：

(一) 家世的關係 宋太祖之父爲宣祖趙弘殷，「少驍勇，善騎射，事趙王王鎔，爲鎔將五百騎援唐莊宗于河上，有功。莊宗愛其勇，留典禁軍。」(見宋史卷一太祖本紀) 宣祖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見資治通鑑)，其自後唐入禁軍，直至後周，時間不謂不久，且由下上升，所以與禁軍的關係是很深的。周時的禁軍已有三衙，即：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指揮使。每軍又立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太祖于高平戰後任殿前都虞候，所以宋史太祖本紀說：「父子分典禁軍，一時榮之。」侍衛親軍創始於唐明宗，見上面石林燕語所述。殿前軍的創始，據石林燕語說：「殿前軍起

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檢點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見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本紀）其實這是以殿前諸軍的整編，並不是殿前軍的創始，因爲舊五代史卷一二太祖本紀說：「廣順三年三月丙戌，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舊五代史卷一四世宗本紀說：「三月十九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驛。」足見在顯德元年十月之前已經有殿前軍了。因葉夢得的失考，而後世即以高平戰後殿前軍的整編，誤爲殿前軍的創立。但是宋太祖由此受周之禪，這是對的，殿前軍是他整編，當然都是他的部屬，侍衛親軍都是他父親的袍澤，因此太祖能掌握禁軍，家世的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二) 義社弟兄的關係 宋太祖起自裨將，爵位不顯，雖受知世宗，統領禁軍。但他所以代周而興，恐與其朋輩，所謂義社十兄弟有很大的關係。但十弟兄的事實，史載不詳，宋朝事實卷九，勳臣條說：

太祖義社兄弟：保靜軍節度使楊光義，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義軍節度使兼侍中李建勳，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秦王王審琦，忠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劉慶義，左驍衛上將軍劉守忠，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彰德軍節度使韓重賈，解州刺史王政忠。

四庫館按語說：

宋太祖勳臣不止九人，此九人中如楊光義、劉慶義、劉守忠、王政忠四人東都事略及宋史俱無傳，石守信諸人傳內亦無義社兄弟之名，惟三槐王氏雜錄有云：「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

按宋朝事實所記太祖勳臣義社兄弟，卽世傳太祖之十弟兄共列九人，缺其一，當爲太祖。九人中石守信、李建勳、王審琦、劉廷讓、韓重賛五人都是禁軍的將領，宋史及東都事略均有傳。楊光義及王政忠二人無傳，但楊光義曾任虎捷右廂都指揮使（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也是禁軍的大校，王政忠曾權知晉州兼晉州兵馬鈐轄，又與郝崇信、郭進同奉詔入北漢界（見長編卷十七），則其亦必爲一軍校，可無疑義。十兄弟中現所不知者，僅爲劉慶義及劉守忠兩人而已。關於十兄弟之偃蹇，據王鞏聞見近錄（卽三槐王氏雜錄）說：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詔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內，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栗，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復偃蹇。」方鎮再拜呼萬歲。

據長編等記載，十兄弟的偃蹇當爲事實，然如聞見近錄所言，恐不可信，此與邵氏聞見錄記王審琦擅入禁中救火，被太祖解去兵權相同（見邵氏聞見錄卷一）。兩事雖皆齊東野語，多不能信，但十兄弟的偃蹇，恐怕是後來杯酒釋兵權的原因之一。宋朝事實所列十兄弟似不足包括太祖在禁軍中之故人。禁軍將領在太祖登極後，多有錫酬，與五代各帝在變亂後卽位，照例對禁軍大校有所酬勞者相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條說：

石守信自義成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爲歸德節度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常山高懷德自江寧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爲義成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厭次張令鐸自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爲鎮安節度

使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自殿前都虞候陞州防禦使爲太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遼人張光翰自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嘉州防禦使爲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安喜趙彥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爲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官爵階勳，並從超等，酬其翊戴之効也。

按此條所稱，不在十弟兄之列的，有：高懷德、張令鐸、張光翰、趙立微四人。高懷德于太祖卽位後，任殿前副都檢點，卒封郡王，與石守信及王審琦相等，長編謂係太祖的故人，交情決非泛泛的（見宋史卷二五〇列傳）。張令鐸于建隆二年出爲鎮寧節度使，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賜甚厚。明年春卒，帝甚悲悼（見宋史卷二五〇列傳）。張光翰與趙彥徽均見宋史卷二五〇韓重贊傳，據說：「重贊與張光翰、趙彥徽分領諸軍節度，嘉其翊戴之功也。」又說：「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趙彥徽之爲太祖故人，固甚明顯，張光翰與太祖的關係雖史載不詳，但韓重贊爲十弟兄中人物，趙彥徽爲太祖所兄事，按列傳歸類的原則，則張光翰亦必與太祖有舊，否則將不與酬勳之列了。由此看起來，建隆元年正月辛亥條所錫封的都是太祖的朋友而與陳橋兵變直接有關的。尚有慕容延劍及韓令坤二人，皆於陳橋兵變之際，奉詔巡邊，便宜從事。及卒，又多得王封與王石高相等。太祖嘗兄事延劍，及卽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一列傳），其爲太祖故人無可疑。韓令坤管與太祖同博士室中，（見宋史太祖本紀）又「與太祖同事周室，情好親密。」則必爲微時故人。因此陳橋兵變時禁軍的內外將領皆太祖的朋友，方成此事，義社十弟兄與陳橋兵變有深切關係，否則何所恃而驕蹇呢？

宋太祖因家世的關係及義社弟兄的關係而掌握了全部禁軍，預謀決非一朝一夕，所以太祖母杜太后

聞太祖代周說：「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見宋史卷二四二杜太后傳），還有續資治通鑑卷二六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壬子條說：「上曰：鞏見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勸令焚毀文書。」世居是太祖後裔，於熙寧時有告謀反，神宗聞王鞏見徐革說，其反有如太祖，勸令焚毀文書。則太祖於未赴陳橋之前，先已焚毀文書，顯是預謀。而太宗因修國史對宰相說：「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于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皆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轉。」（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這是太宗怕史官記實而故爲諱飾的。

周時禁軍尚有重要將領，如張永德、李重進、韓通、李筠等數人，論地位關係均在太祖之上，故在世宗崩前及受禪前後，一一解決。

(1)張永德是周太祖的駙馬都尉，以殿前都點檢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原因是「世宗在道閱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代永德。」（見宋史卷二五五張永德傳及卷一大祖本紀）三尺木之來，實屬可怪，代者爲太祖，不是有很大的嫌疑嗎？

(2)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在周太祖時，地位幾與世宗相等。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說：

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內外兵權，而重進以上英武出己右，心常憚焉。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請入朝，上意未欲與重進